

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

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

总 序

在世纪之交的特殊时刻,人们更加热烈地展望、描绘未来,同时也以复杂的心情回顾、反思着过去。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发展道路,便是这种回顾、反思中的重要课题。应该说,这种回顾、反思不仅仅属于过去,而且联结着未来——联结着中国的21世纪。

人们要确切地了解一个时代思想学术的精神实际,首要在于明了它的社会背景,换句话说,先得吃透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兼及主要矛盾双方的特点,以及它们在具体社会实践中错综复杂的交互影响,尤其在不断前进中体现的客观发展规律。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同样也离不开这一点。

大家知道,旧中国是贫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是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虽还多少不同于当时仅是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过去,孙中山先生曾称之为“次殖民地”,那是很恰当的。但中国又是一个广土众民、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即是存在辉煌过去的大国,只是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政治腐败,乃至影响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停滞不前,从而大大地落后了。同时由于思想学术没有实现近代化,没能大力发展实验科学的研究,导致综合国力不强,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种

只有挨打的局面。于是西方各种思想,乘虚而入,也就是毫无选择地被介绍进中国来,难免令人眼花缭乱。由于当时人们对自己、外境还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并不真实地了解本国的国情,加之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又演进得非常快,在思想界便产生了“盲目排外”、“崇洋媚外”等偏向,以致影响到,即使是立场坚定的爱国志士,一时也有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确切知道什么是眼前中国真正需要的,……。历史在曲折中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旧封建势力与大资产阶级的各方代表自然结成了联合阵线,一致从事抵抗这种新思想,尽管他们各人的动机并不完全相同,面目也不一样;同时也有一些要求进步的学者、思想家,当时限于个人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仅从书本上了解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由于脱离具体革命实践,自然体会会有浅有深,一般说来,不可能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这就形成了1949年前非解放区思想学术界的五花八门。但在现实矛盾的发展中,又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就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而言,思想家、学者们由于接受过去思想文化影响的不同,便有了标榜复兴儒、佛、道学说乃至墨、法……各家的差异。在学风上,有一部分人,喜欢迎合一些外来的新学术,于是,传统的中国学术思想,也有被披上一层外来资产阶级学术的外衣加以传播的。这同样是这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一个特点。自然,其中也有从事比较深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但也有多半出乎牵强比附、乃至臆造完全缺乏科学精神的,要融合东西文化,而且恰到好处,短时间是行不通的。

我们认为要比较全面而深刻地了解本世纪思想学术的全貌,选取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代表作,经过认真的整理(包括校

注),有计划地出版,是一项有必要的工作。所选著作中有的是当时的名著,其它也都有一定影响、可供研究者参考的。我们这样说,自然并不意味着,这些著作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已经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相信读者的批判鉴别力。

严格讲来,不具有高水平的理论修养,兼及工作上实事求是的精神,未经过刻苦的钻研,是很难在短期内写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专著。不是真正了解东西方思想文化本来面目和历史发展的,也很难融会贯通而成功地做出有创造性的新贡献。脚踏实地的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思想,就得不断结合实践,时时进步,时时创造,以期熔铸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于一体。这套《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的出版,无疑会从一个侧面开拓人们的视野,使不致割断历史,考虑问题更加全面而细致,对提高我国现代思想学术的研究水平,必将有所助益。

、是为序。

石 峻

1996年9月25日于北京

重版引言

在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胡适无疑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思想上,他热情讴歌西方近代文明(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文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学术领域,他也是开风气的人物,哲学史、历史、文学史等领域的近代化拓展,均和胡适的名字联结在一起。胡适一生著述甚丰,在这些著作中,《胡适论学近著》是他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①

胡适(1891—1962 年),字适之,安徽省绩溪人。不满 3 岁时,就开始从父母学认字,4 岁,入家乡的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教育。尽管这时胡适表现出某些背离正统教育的倾向,如喜读通俗小说等,但是,对于中国的时局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尚谈不上了解。

^① 胡适其他主要著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文存》(共三集十七卷)等。

1904年,胡适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等校,接受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并在课外阅读了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包括邹容的《革命军》,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当时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还是梁启超,特别是梁启超的《新民说》和《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一类著作,若干年后,胡适还深情地回忆道:“《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第105页)1906年暑假,胡适转学到中国公学,在这里加入竞业学会,并为该会主办的白话小报《竞业旬报》写诗文和小说,这些文章主要是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各种迷信。这种训练为他后来公开提倡白话文打下了基础。

1910年8月,胡适赴美留学,开始了长达7年的留学生活。当时的美国,已经跨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在这里,可以领略到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这对于胡适思想的发展转变无疑是重要的。胡适先入康奈尔大学学农科,后来,他发现自己不适合学农科,就改学文科,专攻哲学,并成为实用主义信徒。胡适留学的最后两三年中,研究讨论最多的问题有两个:方法论和文学改良,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又是胡适文学改良的理论依据。

在美国留学后期,胡适希望回国后能从事思想启蒙工作,实际上,在国内,陈独秀等人正通过《新青年》杂志进行思想启蒙工作,影响也日渐扩大,不久,胡适和陈独秀建立了联系,1917年1月,胡适把他主张白话文的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送登《新青年》,紧接着,陈独秀也著文积极响应胡适的观点,并进一

步加以推进,终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

胡适于1917年夏天回国,旋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继续强调今日的文学应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并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还就戏剧、小说、白话诗的创作,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道德革命方面,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率先向封建伦理道德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与他们相比,胡适更多的是通过“输入”外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来进行批判和启蒙的工作,呼唤人的个性解放。

胡适从事文学革命和道德革命的目的十分明确,即要在思想和文艺方面为中国民主政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前期,在这一点上,胡适与陈独秀等人并没有歧异,那时,他们共同认定,中国要实现近代化,就必须清除传统文化的影响,培植西方近代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且立意长期进行思想启蒙工作,但是,1918年以后,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大钊、陈独秀等日益表现出直接关心政治问题的趋向,在专心从事思想启蒙还是投身政治活动的选择上,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产生了分歧,而这一分歧又蕴含着文化选择上的重大分歧。

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裂后,胡适与丁文江、高一涵等人于1922年创办了《努力周刊》,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在第二期上胡适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文章初稿拟就后,他认为此文可作为公开宣言,以扩大影响,于是邀集一些朋友在蔡元培家中开会讨论,大家表示同意,略事修改,都列名为提议人,除胡适外,签名者有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等,他们主张好人政府,即宪政的政府,要求南北议和,召开民国六年解

散的国会,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减少议员等等,胡适的这些主张,没有触及政治的根本问题,但无论如何,体现了大众的一般意愿,具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尽管胡适已经谈论政治,而他期待的还是通过思想观念的转变而造成政治的更新,因此,胡适并没有忘记文化工作。在《努力周刊》副刊《读书杂志》上曾展开了两次具有深远影响的讨论,一次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另一次是古史讨论,胡适均为讨论中的重要人物。

如果说整个 20 年代,胡适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为之苦恼而不能解脱,那么进入 30 年代,他仍然只能沿着这两个方向前行,从这一点来说,《胡适论学近著》也不失为一个证明。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 年 12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据胡适“自序”：“这里收集的文字大都是最近五年内随时写的,其中偶有三四篇是五年前写的。”全书共分五卷,学术和思想是全书两个基本的主题。

二

《胡适论学近著》中的学术文章,集中于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看法、整理佛教史料和小说史料几个方面。

《说儒》是胡适 30 年代花很大精力写出的论文。胡适认为,在孔子的时候,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据《荀子·儒效》描写:“……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拊其口,则扬扬如也,……是俗儒者也。”俗儒,或“小人儒”,最重要的谋生技能是替人家治丧相礼,其实,一切儒,无论君子儒与小人儒,他们都靠自己的礼仪知识而谋生,孔子也曾为人相礼。

胡适着重指出,“儒”本来是亡国遗民的宗教,所以具有亡国

遗民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到了孔子,他有绝大的信心,而没有那柔逊取容的心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类此的言论表达了一种新的精神品格。胡适以为孔子受了封建社会中的武士风气的影响,把那柔逊的儒和杀身成仁的武士精神合并在一起,造成新的“儒行”,形成一种弘毅的新儒了。

胡适在比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论述了儒家起源以及孔子在儒家发展史上的作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说儒》也成为胡适有影响的学术力作之一。此文也有缺陷,突出的如以老子为老儒,他说老子出于那个前6世纪是毫不奇怪的,他不过是代表那600年来以柔道取容于世的一个正统的老儒;他的职业正是殷儒相礼助葬的职业,他的教义也正是《论语》里说的“犯而不校”、“以德报怨”的柔道人生观。孔子与老子本是一家,老子代表儒家的正统,而孔子早已超过那正统的儒。创立道家思想体系的老子,和儒家思想在根本上是两歧的,而胡适却说老子是正统派老儒,对中国古代思想家流派的分野显然有混淆之嫌。

20年代,胡适计划撰写《中国禅学史》,当他开始研究有关禅案史料时,他感觉到:“今日所存的禅宗材料,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北宋和尚道原赞宁契嵩以后的材料,往往经过了种种妄改和伪造的手续,故不可深信,我们若要作一部禅宗的信史,必须先搜求唐朝的原料,必不可轻信五代以后改造过的材料。”(《胡适论学近著·神会和尚遗集序》,以下凡引该书,仅注篇名)因此,胡适想在敦煌的写本里去搜求有关资料。敦煌写本,上起南北朝,下迄宋初,包括西历五百年至一千年的材料。而这些宝卷大多被英、法以及日本人盗走了。胡适利用去欧洲的机会,走伦敦、巴黎;并绕道日本,请求翻看这些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

了《楞伽宗考》及有关的论文,就禅宗演化的关键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对禅宗史的研究起到了推进的作用。然而由于胡适对禅宗思想缺乏深刻的理解,评述难免也就语焉未详。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胡适以重视方法而著名,他对治史方法的探讨不仅表现在谈治学方法的文章中,而且也贯穿于具体的研究之中,胡适对老子(《老子》)年代问题的考察,就是一例。

在近代老子、孔子孰先孰后的争论中,胡适沿袭清人的一种说法,坚持“老子先于孔子”,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那个神仙化的“老子”还原为哲学家的老子。胡适的观点,首先受到梁启超的反对,冯友兰、钱穆、顾颉刚等人均支持梁启超的意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在直接史料缺乏的情况下,尽量采用相关的辅助材料和自己设定的知识前提,作为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对于这些意见,胡适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等文中作了回应。他首先批评冯友兰的“丐词”说,认为逻辑上的所谓“丐词”,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而“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三个证据,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丐词”。

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胡适显然无法拿出新的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他反对在考证中以疏证代替实证的做法,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对证据不足者,宁肯悬而不断,“我至今还不曾寻得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有必须移到战国或战国后期的充分证据,在寻得这种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延长侦查的时期,展缓判决的日子。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的观点,包含着对疑古思潮以及自己治学方法

的反思和修正，给近代学术的发展以新的启示。

三

《胡适论学近著》偏重于学术方面的文章，同一时期许多讨论政治的文字——尤其是讨论国际政治的文字未收入其中。尽管如此，我们仍能看到胡适关怀政治，特别是文化问题的言论，这些言论，较之学术问题，引起了更大范围的争论。

对于革命的不信任，在胡适一生的思想中是持久的，早在1916年，他就说过，在某些情况下，虽然革命可能是进化的一个必要阶段，但“不成熟的革命……却往往是浪费性的因而也是无益的”。1929年，胡适更充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胡适明确地说，不能把“革命”与“进化”理解为互相排斥的两种过程，然而，他还是仔细地在暴力的和非暴力的革命方法之间做了区分，并明确阐明了他所拥护的只是那种通过教育、立法、立宪政治过程等手段实现其目的的“革命”。

“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

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它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我们走那条路》）

胡适的议论一出，引起思想文化界的惊诧，梁漱溟在《村治》上发表了公开信《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反驳胡适的观点，胡适虽然感到自己的文章过于简略，颇多漏洞，但总体上仍坚持己见。

如果说在政治问题上，胡适给人的印象是温和的，虽不反对变革却常常不触动根本，而在文化问题上，他却是激进的——特别是在 30 年代前后，可以说，他的“全盘西化”言论，主要发表于这一时期，从而使他成为“全盘西化”思潮的一位著名代表。

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这本来是胡适早已发表过的观点，现在他则不时把这一观点推向极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不仅现代文化是这样，即使从历史上来说，中国文化也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在胡适看来，中国“所独有的宝贝”只是“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信心与反省》）中国文化既然如此落后，“全盘西化”自然也就势所

必需。

胡适的言论是片面、偏激的，这一点不需要更多的讨论，需要指出的是，胡适是针对国粹派的若干言论——“固有文化太丰富了”、“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发表自己的观点的，这在国民党统治者极力敌视文化变革而维护陈旧思想体系的情况下，应该说，有一定进步意义。

认真说来，“百事不如人”并不代表胡适对中国文化的真正评价，在胡适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全面抨击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赞扬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如果前者可以支持他的全盘西化主张，从后者却不能引出要全盘西化的结论。胡适对自己思想的矛盾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是，他没有真正解决这一矛盾，只是随着场合、时期的不同，强调不同的方面，从而使他在论战中对中国文化的估价，以至“全盘西化”的主张都有了某种“策略”的意义。这种受功利目的驱使而背离科学精神的做法，其弊端是严重的，也是近代以来东西文化论战、研究不能稳步深入进行的原因之一。

1935年1月，萨孟武、陶希圣等10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必需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须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持论极为笼统，冠冕堂皇，文化问题一时又成了热门话题。当时陈序经主张极端的不调和的全盘西化，胡适虽公开赞成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但是，他认为全盘西化只是一个手段，其结果则是中西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文化，“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

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在同“本位文化派”论战的高潮中,胡适提议用“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他认为“全盘西化”之所以受到不少人的批评,恐怕是因为这个名词有一点语病,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他之所以赞成“全盘西化”,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他的“充分世界化”的主张,认为用“充分世界化”代替“全盘西化”,就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可以容易得着同情和赞助,另外,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因为文化是有惰性的。“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都只是笼统的宣传口号,从数量上来规定,实不得要领,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西化的实质内容。胡适主张以“充分世界化”代替“全盘西化”,代表了他缓和自己与“本位文化派”之间分歧的努力,同时也透露了一点信息:胡适正从激进的立场向温和的方向上转变。

从以上简要的述评可以看出,《胡适论学近著》在学术、思想方面都是有价值的著作。本书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本重印,原书标明第一集,实亦未出第二集;胡适在“自序”中提到“这一集本是《胡适文存第四集》的一部分”,198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在印行《胡适作品集》时,径将《胡适论学近著》更名《胡适文存》第四集,其依据或在于此,然而由于有大量讨论国内外政治的文字未收入,实不能与《胡适文存》前三集相提并论,应以原书名为妥。

原书为竖排繁体字，本次重印改为横排简体字；原书中个别文字、标点等与现在用法不相一致，除明显错误和不当之处作了改正外，其余一仍其旧（如通假字、异体字、得、地、的等）。

顾之武先生在百忙中，鼎力相助，慨然承担了此书的校对工作，辛勤劳作，书此感谢。

张利民

1997年10月于听风斋

自序

这里收集的一些文字大都是最近五年内随时写的，其中偶有三四篇是五年前写的。这些文字差不多全是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的。没有发表过的只有这几篇：

《四十二章经》考和附录三件

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

论《春秋》，答钱玄同

论《诗经》，答刘大白

明成祖御制佛曲残本跋

《参同契》的年代

这一集本是《胡适文存第四集》的一部分。因为有许多讨论政治的文字——尤其是我这三四年来讨论国际政治的文字，——在这个时候不便收集印行，所以我把其中关于学术思想的一部分抽出来，编成这一集《论学近著》。

这一集分五卷。第一卷只有三篇文字：《说儒》一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新鲜的看法，我自信这个看法，将来大概可以渐渐得着史学家的承认，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此外两篇都是讨论治学方法的：《老子》年代一篇是考证学的方法论，校勘学一篇是校勘学的方法论。

第二卷全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只有《真诰考》一篇是关于道教史料的，因为《真诰》牵涉到《四十二章经》，所以我把这一篇也收在这里，第三卷全是整理小说史料的文字。《〈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是一篇游戏之作，收在第三卷里作个附录。

第四卷是我近年对于国内几个重要的思想问题发表的文字。青年的读者若嫌这一集的考据文字太沉闷了，他们最好是先读这一卷。这一卷的文字最容易读；并且这里提出的一些思想问题，也都是值得大家平心静气的想想的。

第五卷是一些杂文，只可算是全集的一个附录。

五年之中，只有这一点讲学成绩，我自己很感觉渐愧。如果这几十篇文字可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讨论和批评，那是我最欢迎的。

二十四，十，二十九日。